

杜定友

本報告內容分館務概

告總館職工個人工作

報告注重實際工作經

做來茲

第一章 館

本館本年度之重要設

一改善各室佈置 本

著教室樓上而編目雜

冊管理自本年超一程

子為佈置(附本館平面

DUDINGYOUHEZHONGGUOTUSHUGUANXUE

和

三廿六年六月底止

館各部工作報告各分館工作報

中國圖書館學

形及數量統計所以瞻前必後而

要

述如左

務室閱覽室原假設工學院機械

室則分設樓下殊欠聯絡且不便

下並因辦事上之利便各室安

附表一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
黄作平与吴耀玉教授纪念奖教金的部分资助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王子舟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王子舟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1

ISBN 7-5013-1889-1

I. 杜… II. 王… III. 杜定友(1898~1967)——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7457 号

书名 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

著者 王子舟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26153 传真(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版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52(千字)

印数 1—2000

书号 ISBN 7-5013-1889-1/G·506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杜定友是我国近现代卓越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活动家。他是我国近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在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汉字排检法、图书馆管理、图书馆建筑、地方文献等方面皆有突出的理论建树,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从事图书馆事业 50 年,矢志不移,倾其毕生。迄今为止,他的学说与事迹仍在中国几代图书馆人中广为传颂。

作者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史,选择杜定友为研究题目极具重要意义。作者认为,处于世纪之交的路口,欲了解中国图书馆学现今所处之地位,以及预测今后之大势,莫如从近现代图书馆学史入手,从历史演进、嬗变中来判定图书馆学当今已行进到了哪一个区间站。非如此,不能解决我们今天存在的某些困惑,获取新的方向感。求因才能得果,鉴往方可知来。而且,了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轨迹,首先就应从代表人物作为切入口。梁启超尝谓历史代表人物为“历史的人格者”,一方面,他们在历史中不可或缺,“抽出”他们,恐局面将全变,如佛教史缺一道安、玄奘,清代思想史中缺一顾炎武、戴震,局面当如何,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他们,他们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这里有个“历史主眼”的问题。研究“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冲动断制,全史迹之筋脉乃可活现(见《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东方出版社 1996

年,134~142页)。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史中,韦棣华、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诸先贤就是这样的“历史的人格者”。抽出了他们,图书馆学史将面目全非。而把握住他们,近代图书馆学发展之要点就会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杜定友,他在图书馆学方面著述最多,创见最多,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大,更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作者以杜定友为研究对象,不仅是想填补某个学术研究中的空白,更是冀图疏理近现代图书馆学史之脉络,为现实图书馆学的发展走向提供一个可供参照的坐标。

图书馆学界对杜定友之研究,在国内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开始。钱存训等在上海编辑的《杜氏丛著书目》(1936 年),内收钱存训、何日章、钱亚新、金敏甫、李昌声、陈鸿飞、俞爽迷、程伯群、吕绍虞、涂祝颜、伍本等撰写的评述文章十余篇。他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杜定友的学术贡献及特点。此后,因战争连绵,除广东报刊上尚有零星文章介绍杜定友外,其他专门研究作品不可多见。1957 年,在杜定友从事图书馆事业 40 年之际,金敏甫、钱亚新曾在《光明日报》(4 月 21 日)撰文,对杜定友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成就给予了肯定。然而不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杜定友的许多学说、观点便遭到了批判。进入 80 年代,随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国内图书馆界开始对杜定友的学术思想又予重新肯定,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张世泰、梁家勉、赵平、张望自、高炳礼、刘少雄、商志馥、钱亚新、卢中岳、白国应、罗屏,以及日本图书馆学者松见弘道等,纷纷撰文对杜定友的图书馆学思想进行了认真研究探讨,范围涉及颇广,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 80 年代的《广东图书馆学刊》上。1987 年,为纪念杜定友逝世 20 周年,钱亚新与其子整理出版了《杜定友先生遗稿文选》(初集)。同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辑了一册《纪念文集》(油印)。1988 年 1 月,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为纪念杜定友诞辰 90 周年,与广东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召开了“杜定友先生 90 诞辰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会后精选出赵平、程焕文等十篇论文出

版了《杜定友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内部印刷)。1988年10月,书目文献出版社为纪念杜定友正式出版了《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至此,杜定友研究方掀起一个空前的高潮。90年代以来,研究杜定友的文章也不断出现。遗憾的是,直至1998年杜定友诞辰100周年到来之际,国内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杜定友学术思想之专作面世。而且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杜定友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除他长期供职的广东地区图书馆界同仁不懈研究他的学术活动外,国内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同仁(如杜定友长期工作过的上海),尚少有人从事杜定友学术思想之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讲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然而最通此理的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者,却大多对近代图书馆学史表示出了相当的淡漠。

梳理与研究先贤们遗留的学术成果,探究其精义,这是我们当今一代图书馆学研究者义不容辞之责任,没有理由将其推给下一世纪的人们。当然,如何研究杜定友及其学术思想,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这也是作者苦思冥想的问题。作者认为,首先应该抱着“历史同情”的态度去认识杜定友及其学术思想。即凡事、凡论,都应从历史客观环境与条件出发,不能作脱离当时实际的判断。故在写作中,作者努力追寻那些历史的客观因素,甚至在某些地方不惜笔墨,力图突显出历史感的弹性。其次,不事先去设定一个主观概念或思想指向。也就是说要保持自己追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亲自去掀开尘封已久的历史册页,踏上布满荒草荆棘的历史道路,不仅发挥自己的理性,同时也调动自己的感性去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怕涉入禁区,更不愿被已有的“定论”遮蔽自己的目光。再其次,在评价一个观点、见解,乃至一个学说时,尽量遍寻与其同时代的有关论述,供作参照。即不得不作评价时,应根据其在所处时代中对前人“增加”了点什么,而不是对我们现在“减少”了点什么。不能用现在的历史条件去要求过去的人物思想。杜定友的一些见解,在如今看来已毫不新奇,乃至平常得不能再平常,而也许在其

时却有着振聋发聩的效用。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不能去漠视的。

作者的愿望是美好的,而本书的写作能否接近这一目标,还望方家训正。另外应提及的是,本书即为作者本人的博士论文(1999年4月完稿)。原稿中“附录二”曾为《杜定友先生著述目录》,但因篇幅太长而删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的张世泰先生编有《杜定友有关图书馆学著述系年》,载于《杜定友图书馆学论文选集》之中,收录详赡,读者需要可供查阅。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谢灼华教授给予了精心指导。杜定友先生的女儿杜鹤鹤,女婿梁国权亦给作者以极大的关爱与支持。杜定友先生的门人张世泰、刘少雄、高炳礼诸先生也为作者提供了很大帮助。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宋安莉、王燕来两位编辑为本书的出版尽了最大努力。作者在此向他们示以真诚的谢意。

此外还要感谢彭斐章、黄宗忠、孟广均、吴慰慈、王余光诸位教授对本书写作的指导与鼓励。

王子舟

2001年9月18日



杜定友像(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

目 录

前言	(1)
1 近代图书馆学之背景	(1)
1.1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	(1)
1.2 杜定友生平及其学术分期	(7)
2 图书馆之观念	(15)
2.1 初期观念及其来源	(15)
2.2 图书馆观念的发展	(22)
2.3 指导实践与坚持真理	(31)
3 图书馆学基本要义	(39)
3.1 图书馆学的发生	(39)
3.2 图书馆学须中国化	(42)
3.3 图书馆学的内容	(48)
3.4 图书馆学的方法	(55)
3.5 图书馆学教育论	(57)
4 图书分类学之贡献	(64)
4.1 统摄中西分类法的创立	(64)
4.2 统一全国分类法之努力	(73)
4.3 图书分类学的早期开拓	(81)

4.4	分类法发展上的远见卓识	(88)
5	汉字排检法发明	(96)
5.1	笔画笔法排检法	(96)
5.2	汉字形位排检法	(99)
5.3	检字法的基础理论	(104)
5.4	“字根”学说及其影响	(107)
6	地方文献三论	(116)
6.1	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	(116)
6.2	地方文献与地方图书馆	(121)
6.3	地方文献工作之内容	(126)
7	杜定友图书馆学之特征	(137)
7.1	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137)
7.2	擅于继承尤能创新	(147)
7.3	博宏与专精相融并重	(156)
	主要参考文献	(171)
	附录:杜定友年谱初编	(178)

1. 近代图书馆学之背景

1.1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

近代中国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是在西方文化强劲推动下产生与形成的。

海通以来,国人最早了解西方图书馆主要通过以下管道:(一)西方传教士等来华介绍图书馆及兴办图书馆。如清嘉庆十二年(1807)英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广州后,任职东印度公司期间曾著有《外国史略》,书中介绍了葡、荷、法诸国的图书馆及藏书。其后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球全志》、美人祎里哲(Richard Quanterman Way)的《地球说略》等,也对欧美国家图书馆事业有所记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耶稣会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设立天主教藏书楼,藏书 3000 册,中西合璧。其后两年,在沪外侨又办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并能对外开放。《申报》后曾介绍其开放情况云:“阅者止须每年费银十两,可随时取出披阅,阅毕缴换。……现计在书院挂号看书者,已有 156 人云”。^[1](二)国内有识之士编译西籍时介绍西方图书馆。清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广州派人编译《华事夷言》,次年又以英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为蓝本编辑《四洲志》,对欧美图书馆多有记述。后魏源依《四

洲志》为基础,参照《职方外纪》、《外国史略》等,辑成《海国图志》,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图书馆。道光二十八年(1848),徐继畲出版《瀛环志略》,对西方图书馆介绍甚为详赡。此外,此时期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夷氛闻记》也都语涉国外图书馆情况。(三)清廷使臣在国外实地考察图书馆。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自强运动后,清王朝开始放弃自尊,先后派遣数批使臣到欧美各国从事考察,或建立公使机构等。同治五年(1866),斌椿等2人游历欧洲10国,随行张德彝记在英国参观图书馆,云“国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2]次年,志刚等人组成外交使团出访日、美、欧洲,曾在美国参观学校图书馆,在英国参观不列颠博物院藏书等,志刚《初使泰西记》中记载不列颠博物院“中建大堂,高数丈,四壁存书以万万计,而中华、日本书籍尤多。”^[3]此后,郭嵩焘出任英国公使,黄遵宪出任驻日公使参赞,都曾参观过当地图书馆,了解其建制。至此,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图书馆事业有了初步的印象。^[4]

19世纪后期,欧美图书馆事业已有公共、学校图书馆诸分别,公共图书馆多设于市区主要位置,面向市民开放,建筑典雅,管理得法,对此我国士大夫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因为中国虽自古就有石渠秘阁之制,但其主要为皇室服务。社会上的藏书楼多出自绅贵,重在典藏,固守严密,地处乡间,民众是与之无缘的。再加晚清以来,国势式微,政局动荡(如太平天国事件)。随着国内士大夫对西方文明认识的不断加深,学习西方之意识渐渐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文化层面,于是有识之士开始力倡仿效欧美,在国内城市中设立新式藏书楼,以开通民智,作育人才。光绪十九年(1893),郑观应《盛世危言》一书刊行,该书分述《道器》、《学校》、《西学》、《考试》诸篇,其中《藏书》一篇详细介绍了英法德俄意等国图书馆,对其各国图书馆之多,藏书之盛,以及公众用书之便称羨不已。他批评国内藏书家固守私秘,或鼠齿虫蠹,或厄于水火。虽有开放者,如吴兴陆氏陌宋楼,为数亦少,“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

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于是建议朝廷“宜飭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夔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5]

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爆发甲午战争,岛国日本竟重创赤县神州,割台偿款,一时震动国人之心,数千年鼾睡之声,乃渐惊起。朝野上下已明确意识到,救亡图存,不在于船坚炮利与工艺制造,而在于作育人才,启迪民智。新民方能新国家。在舆论界办学、设学校、废科举、建藏书楼的鼓吹下,西方图书馆制度开始纷呈于报端,“图书馆”一词从日语借用过来后,也渐渐在社会与“藏书楼”混用、并行。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调殿板及官书局所刻书籍,暨同文馆、制造局所译西书,按部分送各省以实之。其或有切用之书,为民间刻本官局所无者,开列清单,访书价值,徐行购补。其西学书陆续译出者,译局随时咨送。妥定章程,许人人入楼观书,由地方公择好学解事之人,经理其事,如此则向之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6]此时期各地各类学会纷纷组建,学会中新式“书藏”也大量产生,如上海强学会、京师关西学会、保国会、金陵劝学会、扬州医时学会、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武昌质学会数十余个学会,都专设书藏。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为树各省表率,特决定设一大藏书楼。其时国内新式学堂,如上海南洋公学、湘省时务学堂、江南储才学堂、湖州崇实学堂等,也皆设有藏书楼。开我国学校创办新式藏书楼之风气。“戊戌变法”失败后,虽然各地学会被取缔,学会书藏多停办,但是新式学堂却得以保留,使我国近代学校藏书事业从萌芽走向发展壮大得到了保障。

20世纪初年,虽然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但兴办学校、报馆、藏

书楼、课印东西方书籍之风更盛。清中央政府及地方官吏也开始热衷新式藏书楼事业。先是地方官绅合力创办藏书楼,公开向民众开放,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皖省绅士何熙年等“约集同志,创办书楼”,受安庆府方守连轸、前怀宁县姚令锡光爱捐巨资而成;光绪三十年(1904)浙省绅士徐树兰呈请奏咨称,捐银3万余两,在绍兴兴建“古越藏书楼”并向乡人开放,参酌东西各国规制拟制章程,延聘通人专门管理。其后,各省封疆大吏也纷纷向朝廷奏请于各省都会建制图书馆(此时“图书馆”一词已开始取代“藏书楼”通行于世),如光绪三十年(1904)湘抚赵尔巽倡建湖南图书馆,三十四年(1908)奉天总督徐世昌等奏建设黑龙江图书馆折。宣统元年(1909),山东巡抚袁树勋、浙江巡抚增韫、山西巡抚宝棻、陕西巡抚恩寿、云南提学司叶尔恺等,分奏朝廷建设本省图书馆折。截止宣统三年(1911),各省新式公共图书馆约成立有20余所。此时清政府对各地兴办图书馆也加肯允。宣统二年(1910),由学部奏请拟定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正式颁布全国,该章程共20条,对图书馆之宗旨、名称、地址、编制、藏书、管理、开放、经费等事项均有规定。它标志我国首次出现了图书馆法规。如果说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在甲午海战后已处于萌芽状态,那么光宣之年则是其破土欣欣舒叶之时。虽然紧接而来的“辛亥革命”终止了满清王朝300年的统治,中国政局发生了前所未有之巨变,但是新图书馆事业仍按其自为的方向继续朝前发展。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发展,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发展是不同步的。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形成在前,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则较为滞后。尽管在近代图书馆萌芽形成过程中,已有一些论及图书馆的文章出现,但此时尚无探讨图书馆的专门著述问世。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第17期,曾刊载《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新图书馆八点功用曰:图书馆可使学校青年得辅助知识之利,可使不受学

校教育之青年得知识之利,可储藏宏富有供学者参考之利,可使阅览者有随意研究事物之利,可有供人顷刻间查数事物之利,可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可使阅览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可有不知不觉养成人才之利,凡此八利,故可曰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之大机关”也。^[7]光绪三十五年(1909),孙毓修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教育杂志》1卷11至13期,及次年2卷1期、8至11期上开始连载《图书馆》一文。此文原为孙氏所作一部专著,内容分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七章。两年内,孙氏只在《教育杂志》“名家著述”中载毕第四章,后三章内容不得而知。孙氏自称“援仿密氏藏书之约,庆增纪要之篇,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此书。”^[8]其对近代图书馆之宗旨、作用、类型,以及图书馆购书、藏书、分类等内容均有详述。如言图书馆宗旨在于“保旧而启新”,作用为“使一方之人皆得而阅之;著作之家博览深思,以大其文;专家之士假馆借阅,以蓄其德;即一艺一业之人亦得于职务余闲,借书籍以慰其劳苦,长其见识。……校外之生,可以入内浏览,温其故课而启其新知;就学儿童休业之日,亦可入馆,以书消遣;……邑中子弟有读书之便,则移其作为无益之嗜好心而嗜书,其有益于风俗社会。”^[9]谈及类型时,称可据不同目的,分为国立图书馆、各都会公共图书馆、学会藏书、地方图书馆等。在论述分类时,孙氏介绍了杜威十进分类法,并云国内学校英文藏书有使用该法者。由此可知其时杜威之法已流入我国。孙氏感于四部分类太旧,杜威之法又不切实际,故“量为变通”,自拟了一个分类法,有22大部,127大类,许多类目采用了当时世界通用之术语。不过,孙氏很反对藏书依类排架。以上梁启超、孙毓修2人撰述,为近代图书馆萌芽、形成期(即民国以前)重要文献。梁启超、孙毓修都深刻论述了近代图书馆之功用,这表明中国知识界对新图书馆作用已有高度认识。孙毓修之长文,是我国全面系统论述图书馆的最早著述,更具开山之功。梁、孙之撰述标志着近代图

图书馆学已开始萌芽。因梁说仅从功用侧面剖析图书馆,孙说更多是介绍外国图书馆知识,故二氏之说还不能意味图书馆学已经正式产生。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是进入 20 年代开始的。民国三年(1914),来华工作 10 余年的美国友人韦棣华,为使她创办的“文华公书林”(Boone Library)健康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兴旺发达,特派文华毕业学生沈祖荣(字绍期)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攻读图书馆学。此为国人留洋攻读图书馆学之始。民国六年(1917),韦棣华又派文华毕业生胡庆生赴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留学。其时,美国图书馆专门人才的培养刚从师徒式培训过渡到三种方式并存之时期,即图书馆附设培训班,图书馆附设图书馆学校,独立的图书馆学校。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属第二种类型。民国五年(1916)沈祖荣获理学学士学位回国。民国八年(1919)胡庆生也学成回国。沈、胡二人回国后曾致力于图书馆宣传推广运动。尤其沈祖荣足迹遍布国内八九省。民国九年(1920),韦棣华女士与沈祖荣、胡庆生正式在武昌文华大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文华图书科仿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招收大学修业两年以上之学生,期以两年毕业。课程亦仿美而设。图书馆学专业知识的引进及教育的实施,标志着近代中国已经开始有了“图书馆学”。民国十年(1921),杜定友毕业于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系,获文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三个学士学位学成归国,洪有丰(字范五)获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学士学位返回国内。其他学图书馆专业之留美生戴志骞、徐燮元等已经相继回到祖国,从事图书馆事业。一时才如积薪,济济踰阡。他们或奔走国内各地宣传图书馆、创办图书馆,或举办图书馆学短期培训班(如戴志骞等 1920 年夏在北京高师开设图书馆讲习会,杜定友 1921 年春在广州开办图书馆管理员养成所),或刊布著述阐发图书馆学知识(如

1917年沈祖荣出版《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杜定友1921年出版《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在国内的学术舞台上，这些早期图书馆学之关键人物终于纷纷登场。民国十二年(1923)，杨昭愬所著《图书馆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册出版。该书虽多取美、日两国之成法，揉合以贯通。但其已尝试用科学方法来说明图书馆学的原理及应用，而且直以“图书馆学”冠其书名，实开我国图书馆学通论著作之先河。20年代初(1920~1923年)，文华图书科的创立，图书馆学留学专才的粉墨登场，杨昭愬《图书馆学》的刊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的图书馆学开始掀出了新的篇章。其中一人为这新篇章描绘了美丽动人的华彩，他就是杜定友。

1.2 杜定友生平及其学术分期

杜定友(1898~1967)是广东南海人，出生在上海四马路美昌照相店里。祖父曾在香港做过皮鞋匠，父亲杜顺荣(字季康)从业照相。少时因家境穷困，曾三次辍学，并随父母往返沪汉，作过店伙计。14岁时(1911年)考入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属高等小学校，即南洋公学附小读高小。三年级时已开始发表小品、译文等。三年后顺利升入南洋大学附属中学。民国七年(1918)毕业前夕，校长唐文治为该校图书馆无专才管理，故派遣杜定友到菲律宾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留学图书馆学专业。时菲律宾为美国殖民地，菲大亦由美人设立，一切依美国大学制度办理。杜定友在菲读书期间，辛勤努力，半工半读，倍受图书馆学教授包玛丽女士(Miss Mary Polk)赏识及循循善诱。民国九年(1920)，杜定友获得菲大文学学士证书，次年又获教育学、图书馆学两个学士证书及一个高师毕业证(即中学教师资格证)，并提前一年获准毕业。